耕与读

书同

控制新冠疫情最严格的时候，我每天上班，经过小区的拐角，总能听到嘁嘁喳喳的人声。我好奇地从树缝里窥看，原来是几位负责保洁的大妈，忙完道路清扫、电梯间擦拭消毒后，躲到这个不易被人发现的一层物业房，玩一种叫“掼蛋”的游戏。她们围着一张破旧的小桌，个个捂着口罩，故意地压低声音，聚精会神地在那里偷取游戏之乐。

游戏本来是人的天性，劳动、读书累了，有闲暇了，一个人打游戏，或一群人比拼逗乐，率为常事，不足称怪。但这几个保洁大妈的举动，却颇令我加以思考：疫情形势那么严峻，确诊人数与日俱增，死亡信息不断传来，科学家、政府工作人员，一再告诫大家不要出门，不要扎堆聚集，而她们却冒着被感染的危险，以群聚游戏的方式来消磨时光，获取快乐。难道她们真不怕死？非也，她们是实在耐不住寂寞，找不到更好的方式来对付这“大毒蛇一般”的寂寞压抑，正像那些封闭在高楼里的人，用隔空喊叫进行宣泄一样，她们用躲在物业房里打扑克的方式，排解寂寞苦闷。

我对体力劳动者素抱同情，尤其对那些在烈日和暴雨下超时间超强度劳作的人感到深深的敬意。但这一回疫情的冲击，却叫我换了一个角度看问题：无事可做，过度的闲暇，其实也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一个体力劳动者，如果没有能力阅读，较好的安顿生命的方式，其实还是耕种劳作。适当的劳动，不仅是充足体力的来源，也是健康精神的保障，一味的休息，正如无休止的劳动，不仅会让人疲劳、空虚，更会令人焦虑、恐惧。

但仅仅靠劳作安顿生命，却不是最佳的人生状态。在我心目中，更文明、更符合人性的人生，是既耕且读，耕读有机结合。这本来是中国人一向的追求。耕田可以事稼穑，丰五谷，养家糊口，以立性命；读书可以知诗书，达礼义，修身养性，以立高德，“耕读传家”因而成为中华文明最古老的传统之一。

西方人当然也不傻，既耕且读，何尝不是他们的理想追求？英国博物学家怀特住在祖上留下的乡间别墅，边劳作边读书边观察，留下一本《塞耳彭自然史》，成为长久不衰的经典；美国的思想者梭罗，也曾作有趣的耕读实验，留下著名的《瓦尔登湖》。最令我神往且敬佩的是德富芦花，他在东京读书读累了，住也住得烦闷了，便跑到郊外去，在那叫武藏野的乡间，玉川轻轻流淌、人家横七竖八的粕谷村，买下几间民舍和几垄土地，学着农人种菜，栽山芋，在房前屋后植花木，种果树，在亲手建造的草屋书房读书写作，会朋友，那样的情景，不知叫我倾倒了多少回，神游了多少次。那样的生活状态，就是我一生所追求、至今还毫无实现希望的理想。

此次疫情冲击，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破坏自不待言，而给我更大的启发或者警示，却是对个体生命状态的关注。一个健全的国民，应该不仅能耕，而且能读；一个健全的社会，不仅耕者应有其田，还当有其书，读者不仅有其书，还当有其劳。就拿几位保洁大妈来说，如果她们不是只会耕种劳作，还能读书写作，也许根本就不会冒着生命危险寻找乐趣，或许她们也会端坐桌前，捧着一本小说，一本历史书或者随便一册什么书，在精神世界作独自的遨游，尝那思接云外神游八极的快乐。

更进一步，倘若我们的国民，能像德富芦花那样，在都市生活苦闷了，可以到粕谷那样的乡村，买几间房子，安顿一个书房，种几垄红薯，栽一些花木，像村民一样，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让越来越封闭的心胸开阔起来，让越来越细的胳膊粗壮起来，那该多好！如果乡村里的人，都能受到相当层次之教育，有足够的能力闯世界，在乡间呆腻了，到城里找一份足够体面的工作，买得起一处安身之所，谁还会在心中藏着那么多担忧，以致忘却了那么优雅的乡愁？

麦新与《大刀进行曲》

李定国

革命音乐家麦新的短暂人生，犹如一首用血火交织的音符谱就的雄壮进行曲。

孟波与麦新是在白色恐怖下一同出生入死的战友，他曾多次向我讲述过麦新的人生。

麦新的青年时代，抗战正酣。作为爱国的热血青年，他积极参加当时正在上海风起云涌的抗日救亡群众歌咏运动。

麦新的代表作，无疑就是《大刀进行曲》。“七七事变”后，日寇加紧侵华步伐，驻华北的29军为抵御外敌，在长城脚下的喜峰口奋勇杀敌，光大刀队19岁的战士陈永德，一人一刀，就杀敌9名，极大地鼓舞了中华儿女的斗志。人民欢欣鼓舞、热血沸腾。麦新也被这样的抗战气氛包围着。

一天，他在参加上海各界声援29军的群众集会后，激荡的心久久不能平静，脑海中一直闪现着大刀队战士奋勇杀敌的画面。那一夜，麦新失眠了，整夜地琢磨，一直待到一抹晨光折射到他的床边时，望着东方绚丽的曙色，他自言自语地说：“抗战的一天来到了！”当他再重复这话语时，竟兴奋地唱了起来。这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曲调，顺畅自然又热情奔放，极富号召力。麦新反复哼唱了多次，觉得很满意。这一旋律既表达了看到抗战到来的兴奋，又蕴含着抗战必胜的信念。他急忙起床，把这一旋律和歌词写了下来。找到了主题音乐中的主旋律后，麦新兴奋不已，他沿着这种情绪和音乐走向，不断地向这一旋律的前后延伸发展开去，作品很快一气呵成。一首时代的不朽之作，名扬天下的《大刀进行曲》，就这样在一个安静的早晨从一颗不安静的心中迸发出来。

几天后，在南市文庙举办的大型抗日救亡歌咏会上，麦新站在台阶上，亲自指挥万余群众教唱《大刀进行曲》。这是新作的首唱。人们唱了一遍又一遍，群情激昂的歌声划破天际、直冲云霄。打那以后，《大刀进行曲》成了每次重大歌咏活动的必唱曲目。但群众在演唱时，总是习惯地把原本节奏和旋律四平八稳的第一句歌词“大刀向”，唱成了切分音符并有延长音，这样的音乐语言和节奏更显铿锵有力更有气势；而且在歌曲的高潮和结尾处，群众又总要加上一声激昂的呼喊：“冲啊！杀！”这种发自群众内心对作品两处不经意的、画龙点睛式的改动，无疑使歌曲增色不少。不久，在冼星海家中的碰头会上，又有同志建议把原歌词“二十九军的弟兄们”，改成“全国武装的弟兄们”；把“咱们二十九军不是孤军”，改为“咱们中国军队勇敢前进”。麦新欣然接受了大家的建议和群众的见解、呼声，对作品进行了修改。

不久，这首歌随着抗日将士在浴血战场上的高歌，很快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激励亿万中国军民打败日寇、实现民族解放的号角。

引鲤

詹超音

大治河通海，水随潮动。

人工开挖的河道都有一个明显特征——岸线笔直。岸边有栏，栏笔直；沿河有道，道笔直。河、栏、道一同延伸，在很远处集成一点。

来这儿散步的人很多，放眼水天，看船近船远，鸥鸟扇翅。来这儿垂钓的也很多，他们放长线，鱼漂在很远的水面浮动，要点眼力。路人会驻足观看。垂钓者一般都不喜欢身旁站人……丰收者例外，会允你动鱼篓子，检阅他的成果。

又到“春泄”时，鱼儿最为兴哄。“泄”，是指鱼产卵的状态。

有一个人倚栏持竿。他的竿与众不同，竿头无梢，线粗如绳。一条尺把长的鲤鱼在水面奋力游动，它的背鳍让线拴着，只能在这一小片水域内反复回旋，不知疲倦。持竿人双目烁烁，他时而放松臂膀，任由鱼儿下潜；时而稍提鱼竿，鱼又回到水面。他在遛鱼，行话叫“引鲤”。鲤鱼为什么一定向被囚禁的同伴聚拢，是好奇还是试图解救？不得其解。

“这能引来鱼？”

“只要鱼在附近，肯定过来。”

“你怎么知道？”

“鲤鱼的吻骨发达，爱拱泥，拱新泥，拱泥是为了摄食。所以只需在岸边引。这儿的驳岸刚整过——鱼要来了！”

“我们这么大声说话，会不会吓跑鱼？”

“不影响。但不能跺脚。”

“鱼来了你能知道？”

“当然。来鱼时水下有黄黄的、红红的身影。小的鲤鱼甚至会骑到我的鱼身上，大的会在水下往上拱，把我的鱼拱得翻过来。”

引鲤人身边搁着一柄鱼叉，阵势如同“捉奸”。他这是纵而引之，让动情的鱼儿付出何等大的代价。

夕阳西下，引鲤人耗了小半天工夫，毫无收获。不知为何，我希望他失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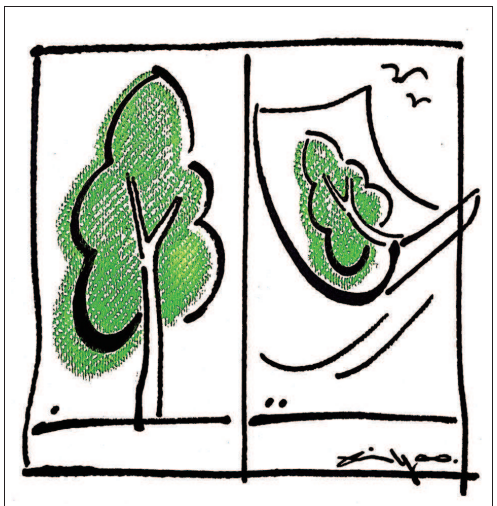
大西北的人视鲤鱼为珍品，餐桌不摆上黄河大鲤鱼，不体面。

我早先在幼发拉底河钓到过不少鲤鱼。伊拉克人非常喜欢吃鲤鱼，他们认为鲤鱼才是真正的fish，所以会拿东西换我手里的鱼，甚至掏钱向我买。一条三斤重的鲤鱼值两罐德国咖啡。

上海人却都不怎么喜欢吃鲤鱼，嫌肉薄肉老，且带土腥味。在上海工作和生活的外来人士大喜过望，上海人不吃我们吃，这么好的鱼！父亲生病时我煮过鲤鱼汤让他喝，他胸腔积液，四肢浮肿。鲤鱼能化水。

写此文前我特地到鱼摊问价。摊主问我取活的还是要收拾好的，活的拿走8元，杀好弄好5元。耗时耗力反而便宜，这是为何？

我让摊主挑了一条，去鳞开膛后求解。摊主说，求活的那是用我的鱼去引鱼，当“人质”。我抬价，他们懂。相中了，没有还价。他举起一条鱼，使劲摔在地上。鱼在那儿抽搐。这帮引鲤人，真缺德！摊主很来气，此时就像个左插弓右插箭手提大砍刀的武生，他很利索地扒出鱼的内脏，完成了宰杀。



智慧快餐

郑辛遥

形式主义的特征：做虚不做实。

“炒鱿鱼”与最低工资

陈钰鹏

从前，打工者被老板解雇，便要立马卷好被褥走人。后来人们也就用“卷铺盖”来代替“被解雇”。至于“卷铺盖”为什么又叫“炒鱿鱼”，这跟香港话（广东话）有关。香港话称解雇为“炒鱿鱼”，据说炒鱿鱼时，鱿鱼肉会卷起来，跟卷铺盖的过程很相像。

生活在一个社会里，不论是何种体制的，社会结构通常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用人单位，另一方面是劳动者，用人单位必须依法支付给在法定工作时间内提供了正常劳动的劳动者一种不低于法定最低工资的报酬。1894年，新西兰颁布了世界上第一部最低工资法；世界各国一般通过立法确定最低工资标准。我国1994年的劳动法和2004年由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最低工资规定，确立了最低工资的保障制度。

欧盟的汉斯-伯克勒尔基金会所属的经济和社会研究所提供的数据表明，从2019年4月1日起，德国的雇主付给雇员的最低工资不能低于9.19欧元/小时，不允许签订低于此标准的劳资协定；换句话说，德国的最低工资在欧盟占第七位；第一位是卢森堡（11.97欧元/小时），此后是法国（10.03欧元/小时）、尼德兰（荷兰，9.91欧元/小时）、爱尔兰（9.8欧元/小时）、比利时（9.66欧元/小时）和英国（9.28欧元/小时）。西班牙居中（5.45欧元/小时）、斯洛文尼亚（5.10欧元/小时）、马耳他（4.40欧元/小时）、希腊（3.76欧元/小时）、葡萄牙（3.61欧元/小时）、立陶宛（3.39欧元/小时）、爱沙尼亚（3.21欧元/小时）、捷克（3.11欧元/小时）、波兰（3.05欧元/小时）、斯洛伐克（2.99欧元/小时）、克罗地亚（2.92欧元/小时）、匈牙利（2.69欧元/小时）、罗马尼亚（2.68欧元/小时）、拉脱维亚（2.54欧元/小时）、保加利亚（1.72欧元/小时）。

知苑新语

提到最低工资时，绝对数字并不能说明某人的生活过得怎样，而是必须同时看到物价指数和购买力，如果这些因素同时考虑的话，那么生活水平的排名就会发生变化，如罗马尼亚在欧盟的最低工资排位本来是第20位，由于该国公民的购买力较高，所以生活水平排名便升至第12名。再如按最低工资绝对值排名第九位的斯洛文尼亚，如果以购买力衡量，生活水平就降至第17位。若用德国人的购买力来评价，则他们的生活水平排在欧盟的第四位。

总之，实行最低工资制，是为了保障劳动者拿劳动换来的起码生活水平，无论哪一种社会体制，都应努力认真去做。

夜光杯

中医药一家

何鑫渠

说起中医，目前分歧有些大，爱之者视中医为爱国标准，恨之者视中医为现代巫术。但不管哪一派，科学理性对待中医中药最为重要。

中药以植物为基础，谓之“本草”。植物使人活，也能使人死，自然还能医病。中医首先是实践科学，应该是先有中药再有中医。所以古今中医和中药不分家，比如李时珍就被目为医家及药家。我老东家杭州胡庆余堂，当时就有两位中药师，还拥有中医师执照。他们有时还自采、自己炮制中药材。同样的药，疗效胜过大医院中的中医师，以至于许多高端人士也都屈尊前来找他们看病。

目前，国家层面出台的政策非常符合中药研发应用的实际。我工作的一家中医药公司的两个产品，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而它们均来自上海名中医平时诊治疾病的经典名方。

现代社会分科越来越细，西医西药分家管理正在中国推广实践之中。那么，中医中药是不是也要跟上呢？根据经验教训，我以为坚持中医药一家的传统，中医的发展才有未来。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条例》于日前“寿终正寝”，显示出国家对中医药事业的发展持续加温，相信中医药一家的传统势必得到继承和弘扬。

灯花

七夕会

带上扑克，出发！

郑自华

旅游是个累活，既然是累活，旅游途中就需要调剂一下精神，那就不妨带上扑克牌，增加一点乐趣。扑克牌的游戏功能多，像争上游、80分、斗地主、干瞪眼、24点等；扑克牌轻巧，便于携带；扑克牌方便，在火车上、轮船上、在饭桌上、在宾馆里，两个人以上，甚至一个人也可进行，老少咸宜。

其实，扑克牌还有其他功能——

谁免单：聚会搞免单是开心事，以前让大家竞猜这桌酒水的价格，谁报的价格最接近买单价，谁就可以免单。问题是猜中的往往是“买汰烧”，因为他们熟悉行情。现在用扑克牌随机抽取，事先约定某张牌，谁抽到指定的牌谁免单。

拉郎配：一次文友外出旅游，10个人，5男5女。我取出5张牌，分别是红心JQKA和大王，又抽出5张黑桃JQKA和小王。让女士随机抽取红心牌，然后让男士摸黑桃牌，我让红J和黑J配对，以此类推，这样就随机配成了5对临时搭子。临时搭子吃饭坐在一起，旅游互相照应，这叫拉郎配。还别说，这样的组合，带了很多的欢笑，男士尽显殷勤，个个成了绅士，女士尽显优雅，人人都是淑女。

搞抽奖：去年4月，原单位同事组织到安徽宁国3日游。第三天，吃了早中饭，打点行李，上车准备返沪。此前，专门管账的同志问我，说是账面还有152元余款，怎么处理？这次出行我们专门包了一部车子，车上54人都是自己人，将152元退给大家，每人连3元钱都分不到，与其分掉不如让大家抽奖。我让经办同志买10听酱菜，剩余50元买个童子鸡，老板娘听说我们搞抽奖，特地将童子鸡换成100元的老母鸡。老板娘另外给了我们三个领队每人一份当地的竹笋等土特产，三个领队表示将赠品也一块参加抽奖。上了车以后，我取出事先准备的两副扑克牌，一副牌请人在车厢让各人抽取一张，然后我在车子的前面，将手里的一副牌用作抽奖。一共有20份奖品，第一份奖品是一听酱菜，我从扑克牌中随机抽出一张牌，就这样，19份奖品在欢笑声中都名花有主。最后是那份大奖——老母鸡。我将手里的牌洗了又洗，然后抽出一张牌，故意挡住，然后一点一点移开：“是黑色的。”一半人叹了口气，另一半人开始骚动，“不是草花。”于是车上又是一片嘻哈，“不是老人头。”手里拽着黑桃的10个人兴奋了起来。见大家的情绪高涨，我猛地将牌翻过来：“黑桃10！”只见坐在中间的金女士哈哈大笑：“老母鸡归我啦！”有人羡慕地说：“金鸡报晓，谁让人家姓金？”一路欢笑一路歌声，不知不觉到了上海。

以后出去旅游，都有人会问：扑克牌带好了吗？

雅玩